



自由与包容 西南联大的人和事

任继愈 / 著

“赓续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保存了知识和文明的火种。”

乱世中的奇迹，学术自由的殿堂

国乱不至学乱，颠沛流离而大师辈出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自由与包容

西南联大人和事

任继愈／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人和事 / 任继愈著. —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392-9592-3

I. ①自… II. ①任… III. ①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IV. ①G649.28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9549 号

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人和事

ZIYOUYUBAORONG XINANLIANDARENHESHI

任继愈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mm×1230mm 32 开本 8 印张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9592-3

定价：36.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JXJYCBS@163.com 电话：0791-86705643

网址：<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 -02-2017-15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序一 西南联大与“五四”传统·····	1
序二 关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9

辑① 联大永存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京大学·····	21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	44
我心中的西南联大·····	57
回忆西南联大·····	65
《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	116
“小长征”决定哲学救国·····	123
西南联大人和事·····	131

辑②
桃李芬芳

吴宓先生·····	149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贡献·····	157
刘文典先生·····	171
我钦敬的陈岱孙先生·····	176
钱穆先生·····	182
一代大师，因小见大·····	187
郑昕先生·····	197
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	201
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	206
闻一多、顾随先生·····	212
才性超逸，校雠大家·····	216
金岳霖先生·····	223
忆金岳霖先生的一堂教学和两则逸事·····	228
附录·····	233



序一



西南联大与“五四”传统

“西南联合大学”是一所特殊的大学，既前无古例，亦后无来者。

说其特殊，首先是寿命之短。1937年，北京沦陷，平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半年之后又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直至1946年迁回京津，恢复原三所大学建制，前后不过八年。

说其特殊，更在于它所取得的成就。短短八年，又是在抗日战争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数学家陈省身、华罗庚，物理学家周培源、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杨石先；人文社会科学亦无例外，任继愈、王瑶、阴法鲁、冯契、杨志玖、逯钦立，皆

卓然成家。

“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办大学的奇迹，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极为独特的教育现象。

任继愈先生既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后又担任西南联大的教师。北京大学南迁长沙时，任继愈先生是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他从山东千里迢迢赶赴长沙报到。1938年，临时大学迁校云南，闻一多率领240名学生从长沙徒步昆明，历时两个月，行程三千里，可称抗战时期大学的“万里长征”，任先生是其中的一员壮士。1939年，任先生考取了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

如任先生所说，西南联大这一段经历，在他人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直接影响到他选取中国哲学史作为他一生的研究方向。“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景象。靠了他们承载着这个又穷又大的国家。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自传》）对于西南联大的老师、同学和那一段学习

经历，他老人家怀有特殊的感情，生前写有多篇文章，与我聊天时也常常讲到，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现在重读任先生的文章，我领会到，任先生怀念、总结西南联大的历史，不完全，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怀旧情，实有对中国教育的理性反思，寓意甚深。

十余篇文章，有谈人，有忆事，用一句话概括其要义，就是西南联大靠“五四”精神创造了奇迹。“如问西南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外抗日寇，内争民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我心中的西南联大》）

论起教育，所谓“大学乃有大师之谓也，非有大楼之谓也”，都被大家讲滥了。然此话喻之西南联大，才最为切当。任先生回忆，西南联大的校舍极度简陋。1938年刚到昆明，理、工两院暂借校舍，文法学院则在云南南部的蒙自设立分校。1939年始建成新校舍，一百余间平房，土墙泥地茅顶，教室、实验室和学生宿舍就挤在这低矮、简陋的房内，图书和仪器设备，也只能勉强应付教学的最低需要。因为用房紧张，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和导师同住在一个宿舍，同吃在一个饭厅。而当时师

生的生活，多在半饥半饱的状态，生活极为困苦。闻一多先生一家，每天只能喝两顿稀饭，靠治印补贴家用。一些教授只好到中学兼课维持生计，似刘文典那样为人撰写墓志赚些润笔，已是相当不错的了。与今之大学高楼广厦的富丽堂皇、教授的衣食无忧，几乎是天上人间，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由于三校合为一校，西南联大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看看阵容：一年级语文老师余冠英、李广田、沈从文；英语老师王佐良、李赋宁、查良铮；文科研究所导师陈寅恪、傅斯年、向达、姚从吾、郑天挺、罗常培、罗膺、杨振声、汤用彤、贺麟，可谓一时之盛。所谓大师者，此之谓也。对于这些老师，任先生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写了《贺麟先生》《回忆金岳霖先生》《刘文典先生》《钱穆先生》《闻一多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等多篇回忆文章。

不过大师云集，实乃机缘凑合。但如何保护好学者研究与教学的权利，活跃学术风气，激发学术的创造力，才是大学办学的关键。在任先生心中，“北大之‘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之大”，“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北大的‘老’与‘大’》）；“西南联大值得怀念的是它的自由宽容、博大深宏的学风”（《我心中的西南联大》）。据不完全统计，

联大八年所开的课程，竟然达 1600 门以上。同一个课程，闻一多和罗庸都讲唐诗，观点却不相同；罗庸讲楚辞，闻一多也讲楚辞；一样的古文字学，唐兰和陈梦家不同。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闻一多来听；数学系教授程毓昕郑昕的“康德哲学”课，至于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听者多为中文、历史、哲学的老师，陈寅恪遂有“教授的教授”之称。联大的课外学术活动丰富多彩，学术演讲几乎每天都有，学术社团经常组织各种学术活动，文科研究所罗常培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报告会，任先生听过的就有汤用彤的《言意之辩》、向达《唐代俗讲考》、冯友兰《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知行合一新论》、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活跃的学术风气，最终获益的还是学生。

“百家争鸣，学术民主，不但在同辈中盛行，师生之间也不乏这种宽容求是的事例。”（《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任先生的文章，生动地叙述了联大师生学术平等的故事。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自然是得天独厚，在研究所的小天地里与导师吃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如古代的书院，既可四时请安，又可随时问道。一般的大学生虽不似研究生，与老师如此亲密，但与老师亦有经常的交流，而且撰写论文，可以与导师的意见相左，只要持之有故，论文就可以通过。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王玉哲不

同意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关于《齐物论》作者的意见，发表文章提出商榷，考研究生时，壮胆报考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而被录取，并未因学术观点不同受影响。杨振声指导本科四年级学生写论曹禺的论文，学生迟迟不能交论文。杨振声约学生谈话，原来学生不交论文，是因为学术观点与杨先生不同，怕在杨先生那里通不过。杨振声告诉学生，只要掌握原始材料，认真研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必和老师的观点一致。“学术面前，只重证据，不论资格”。从学术的本性上，给予学生以创新的胆气。

宽容的学术环境，是学术研究的温床。虽偏居西南一隅，闻一多利用西南地区民族、民俗的活化石研究《诗经》《楚辞》和古代神话，开创了研究的新生面。罗常培亦利用西南民族的语言资源，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学的新领域。贺麟创立了“西洋哲学编译会”，主持编译西方哲学。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他在联大的讲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熊十力《新唯识论》、钱穆《国史大纲》也都完成于此一时期。所著多为传世经典，何止是成就斐然而已！

西南联大“五四”传统的另一体现是爱国和民主。任先生回忆联大生活，总结联大的办学精神，既讲学术自由，又讲爱

国和民主。冯友兰先生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也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乃是西南联大精神。而这也正是“五四”的精神，西南联大继承了这一传统。

联大的师生虽然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或“左”或“右”，见解分歧，但是却都有共同的爱国信念，抗击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爱国成为西南联大师生的凝聚力，也成为学生克服困难、砥砺成才的动力。所以，虽然天天有日寇飞机轰炸，物价飞涨，师生食不果腹，联大却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

争取民主也是西南联大精神所在，而这一精神亦来自“五四”传统。1944年，重庆政府把“青年节”的日期，由5月4日改为3月19日，以此防范学生的民主运动。联大学生鄙视、无视政府的通令，举办了一系列“五四”纪念活动；1945年，又举办了更盛大的“五四周”，联大学生精神由此而出现复兴。1945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联大学生开展了血与火的反内战学生运动，展现出他们不屈的壮志，教授闻一多的鲜血亦染红了西南联大这片土地。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证明西南联大的老师不是死读书的学者，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

亦非读死书的学生，而是关心天下大事，关心国家命运的志士，这也是西南联大不朽的遗产。

1943 年 12 月，林语堂从美国回国，到西南联大演讲，他用“不得了”感慨西南联大师生生活的艰苦，又用“了不得”赞誉联大取得的成绩。林语堂是文学家，搬弄文辞，是他的本事，也是他的常态，而此“不得了”和“了不得”，确实表达了人们对西南联大由衷的敬佩。

詹福瑞

2017 年 4 月



序二



关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闻名遐迩的西南联合大学，今年将迎来它的八十寿辰。在八十年的岁月里，它的光辉没有黯淡，而是越来越明亮。人们怀念它、纪念它，这是不能忘却的纪念。

有人提出重建一所西南联大，发扬它的精神。大家也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环境也不一样了，人更不一样了。真的，连昆明的天也不像以前蓝得那样清澈了。

首先大环境不一样了。那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一种生死存亡的紧迫感，让人不能懈怠。这是大环境。从在长沙开始直到抗战胜利，不断有学生投笔从戎。学校和民族命运是一体的。据联大校史载：先后毕业学生三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奔赴抗日前线和留在学校学习，是一个事物的两个

方面。冯友兰先生曾在他为学校撰写的一次布告中对同学说：“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不论是直接参加抗日还是留校学习，“全国人士皆努力以做其应有之事”。前者以生命作代价，后者怎能不以全身心的力量来学习？学习的机会是多少生命换来的？学习的成绩是要对国家的未来负责的。所以联大师生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从未对教和学有一点松懈。1938年，师生步行从长沙经贵阳，跋涉千里，于4月26日到昆明，5月4日就开始上课。1942年以前，昆明常有空袭，跑警报是家常便饭，是每天必修之课。师生们躲警报跑到郊外，在乱坟堆中照常上课。据联大李希文（现任云南大学外语系教授）校友回忆，冯友兰先生曾站在炸弹坑里上课。并不是没有别的教室，而是炸弹坑激励着教与学，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上昭日月。

西南联大的子弟从军旅者也不乏其人，这也体现了父辈的爱国精神。梅贻琦先生之子女，梅祖彦从军任翻译官，梅祖彤参加国际救护队；冯友兰先生之子冯钟辽、熊庆来先生（当时任云南大学校长）之子熊秉明、李继侗先生之子李德宁都参军任翻译官。当时，梅祖彦、冯钟辽都在联大二年级，未被征调。他们是志愿者。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刻录了参军同学的名字，

但因当时条件限制，未能完全收录。在这里，我愿向碑上有名或无名的所有参军的老学长深致敬意！

管理学校，校方要和政府打交道，这可以说是一个中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学校当局有多少自由，以实行自己的规划，对办好学校来说是关键性的。1940年6月，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驳斥教育部的三度训令。何炳棣先生认为此函执笔者非冯友兰莫属。全文如下：

敬启者：屡承示教育部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第25038号，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高壹3字第18892号、二十九年五月四日高壹1字第13471号训令，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敢，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此，所

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